

中華藏書百部

中華大清十二帝



学术顾问：汤一介 文怀沙 主编：涂寒

全新校勘珍藏版

清官密档全揭秘 大清皇帝全纪实

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中华民族谱写了大量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本书以十二位皇帝在位期间的主要事件为线索，加以精彩评价，让读者在故事中品鉴清朝十二帝，品鉴一个王朝的兴衰没落，品鉴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



中国书店

K827=49
201223
2

阅 览



【中华藏书百部】

学术顾问◎汤一介 文怀沙

主编◎徐寒

中华大清十二帝



【中】

全新校勘珍藏版



中国书店

第一章 初登宝座

何明史

第六卷



雄才大略，诗人皇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历史评价

乾隆帝名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

如果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主要是编修文化典籍。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部，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从以上成就来看，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他的前期统治推动了又一个封建盛世的到来。但其统治后期出现了更多的腐败没落现象，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好大喜功，疏于防范，致使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致使贪贿成风，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标志着清王朝从强盛走向了衰败。所以我们给他的总体评价是功过参半。



第一章 初登宝座

一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的深秋，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里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雍正皇帝驾崩了。

弘历在父丧的哀戚声中，在诸王大臣们恭诚的叩拜和敦促下，将象征最高权力的皇位纳入手中。他根据父皇临终的遗命，宣布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大臣辅政。一个以新皇帝为核心由先帝生前宠信的宗室大臣为辅佐的最高权力机构就这样诞生了，而这一切，距雍正帝的崩逝不过一两时辰。

天还没亮，弘历奉雍正帝的遗体返回了紫禁城，在他的主持和率领下，当天下午，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以及宗室贵戚、朝廷命官，齐集内廷剪发成服，将雍正的遗体入殓。

弘历在异常的忙碌中度过了三天，父皇的大丧在肃穆的气氛中成礼。接下来的，当是嗣皇帝的登基。

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向全国颁布了雍正皇帝的遗诏。九月三日，弘历在祭告了天地祖宗之后，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着他诏告天地，宣布改明年年号为乾隆元年的那一刻起，乾隆皇帝便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这年他刚刚二十五岁。

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当他第一次坐在金碧辉煌的御座上，俯视着王公百官匍伏于他的脚下，听着震荡整个大殿的高呼万岁声，他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最大的满足。这坐落在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宝座，是真正的天心地胆的位置，它象征着对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最高支配权，谁拥有了“宝座”，谁就拥有了天下。



他一时陶醉于这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场景中……

封建时代赋予了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运筹大业，号令天下，几乎无时不在操纵和影响人类历史的命运。乾隆皇帝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乾纲独断的统治作风，使有清一代的专制统治登峰造极。

八月十五日，即雍正帝崩后的第三天，为了维护先帝的形象，也为了他自己的那份虚荣，乾隆将几个道士赶出宫中，并颁旨诏示天下。他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乾隆急于洗刷父亲身上的“污迹”，匆匆忙忙抛出了这道上谕。然而，刚刚登上大宝的新皇帝却忘了投鼠忌器。他那“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的表白，反倒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完全暴露了雍正帝迷信于炼丹术，以及他服丹中毒的隐情。

然而，这小小的失误，却使年青的皇帝迈出了他初政的第一步，它预示着一个充满青春活力、锐意改革的新政即将开始了。

事实上，乾隆从父亲的手里，承继的是一份几乎可以使所有帝王都为之歆羡的基业。大清王朝，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他登基之时，业已国家升平，民物晏安。作为一个步入太平盛世的天子，弘历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虽然新皇帝年纪尚轻，但绝非平庸之辈，他在喜悦与兴奋的同时，感到了这份家业的分量，意识到治理和驾驭这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绝非易事。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他发奋振作，让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乾隆无疑是一个福命的皇帝，他一帆风顺地登上了皇位，面临的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时局。他没有遇到太多的棘手的问题，更没有遇到爆炸性的危机。但是他同样面临着急需解决的社会矛盾，面临着需要调整 and 治理的国家政治。而对于刚刚继位的乾隆来说，面临的重大问题，莫过于雍正年间父亲实行铁腕政治所造成的后遗症。

雍正后期，长大成人的乾隆已封为宝亲王，在奉命参予政务的过程中，他深



切地体验到了雍正的统治手段，他钦佩父亲的才干和魄力，但同时不满于对父亲的严刻猜忌。直觉和感受使他意识到，雍正以强权政治诛戮宗室，打击异己，虽然使皇位得到巩固，却使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哀怨声中。封建专制政治下，本来就不存在平和宽松的气氛，而雍正帝的严刑峻法，更是将人们置于一种恐惧不安、提心吊胆的境地之中，人人怀着惴惴之心打发着岁月，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的空气，传播着不满的情绪。这对于一个肩负守成重托的君主来说，绝非好的兆头。何况乾隆与父亲之间不仅存在着性格差异，且在政治上也存在着分歧。

乾隆历来主张宽大为治，尽管他的父皇每每以他赋性宽缓训诫教诲。然而，一旦他君临天下，昔日的政治见解，仍会执着地变成国家的法令政策，促使他去作一番尝试的。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颁布谕旨，明确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

于是，在宽猛相济的口号下，一个又一个调整前朝统治政策的法令措施，颁行于全国。

——他禁止地方清丈土地，虚报开垦。

——禁止工程捐派。

——废弃由官府掌管民间房地产交易的“契纸契根法”，还民买卖自由。

——停止没有实效的“营田水利法”和复古的“井田制”。

——恩诏蠲免各省民户积欠钱粮。

在乾隆看来，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实为扰累闾阎之政，而他的新政，则要减去一切繁苛，与民休息。

然而，乾隆深知，他的父亲一生中最受指责而致声名狼藉的是对宗室兄弟的残忍无情。不管在这场争夺帝位的斗急中，父亲有多少迫不得已，都无法摆脱残害手足的恶名。他的大伯父允禔、二伯父允初都是在康熙朝被禁锢的，父亲没有释放他们，二人都死在高墙之内。三伯父允祉、十叔允禩、十四叔允禵也被永远圈禁。最悲惨是他的八叔允禩、九叔允禔，他们被削籍禁锢，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在受尽百般折磨后，又被秘密处死。而且，这场骨肉相残的斗争，株连甚广，五叔允祺之子弘升、七叔允祐之子弘曙也因此被削去世子，而宗室之中，被关被杀，削籍夺爵，抄家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父亲甚至连亲生的儿子也没有放过，三哥弘时同样被黜革宗室。



皇家内院，历来最薄亲情，骨肉杀戕的悲剧，几乎无代不有。然而如雍正之严酷者，仍属鲜见，这使他的政治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乾隆亲身经历了这场家庭的惨变，对其中的利弊曲折，自然有他自己的判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八日，即位刚刚一个多月的皇帝，便针对这桩历史公案，发布了第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诏旨：

允禔、允禔，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在以“孝悌”治天下的思想制约下，乾隆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翻案，但却要消弥来自父亲严猛政治的弊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皇权至上，皇帝可以生杀人，荣辱人，更可以嫁祸于人。他宣称“当初办理此事，乃诸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既为父亲摆脱了干系，又为自己找到了翻案的理由。

两天之后，乾隆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迫退宗室觉罗，分别赐予红带、紫带，载入了玉牒，一大批皇子皇孙恢复了名号。

一个月后，雍正的死敌阿其那、寒思黑之子孙，也被收入玉牒，给了红带子。

接着，又有许多被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广宁、扬德、华玠等人，均被释放回家。就连最重要的案犯允禔、允禔也被解除了圈禁，赐以公爵，允禔尤以亲叔父受到眷顾。

此外，乾隆更没有忘记为他死去的三哥弘时昭雪，他还给弘时的皇子身份，令收入玉牒。

短短数日之内，乾隆为父亲了结了这场结怨颇深的历史公案。他虽然没有平反全部的案情，却改变了对所有案犯的过重的处分，顺从了民意，这实质上是翻了雍正所定的旧案，但乾隆却一再声称，这是遵照父亲的本意。在这一道道翻案的谕旨体现了新皇帝的干练和精明。

随着宗室王的获释，对全国狱案的纠偏继之而起，一些无辜蒙冤、罪轻罚重的官吏士子，也从枷锁之下解放出来，因贻误军机判处死刑的骁将傅尔丹，以朋党之罪处斩监候的总督蔡珪，以及诽谤程朱、发配军台的谢济世，均被赦免。就



连文字狱要犯查嗣廷、汪景祺的家属也被恩诏释罪。那些因亏空钱粮，侵吞公帑被罢被革的官吏，更是一体宽释。

皇帝的朱笔之下，每日都响起震动天地的惊雷。宽大政治就像一股春风，将新皇的“宽仁”送到了王府官邸，也送到了黎民百姓之家。

但新帝虽“宽仁”，却不同于普度众生的菩萨。在乾隆处理雍正的积案时，并不是一律从宽，还有一些由宽改严的案例，如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

曾静是湖南的士子，张熙是曾静的学生。二人因接受了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华夷之辨的反清思想，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起兵反清。并且道听途说，收集了一些来自宫廷的流言，斥责雍正帝弑父篡立，屠戮兄弟，逼杀生母，淫烝父妾。在这些耸人听闻的奇传中雍正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

奇怪的是，一向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只将死去四十余年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戚属坐罪株连，却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颁旨告诫子孙将来亦不得因曾、张诋毁自己而追究诛戮。更令人不解的是，雍正皇帝对曾静、张熙的反清思想及其散布的流言蜚语，进行了公开的辩驳，刊刻《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全国，令地方官每月朔望宣讲。这种越描越黑，越搅越混的辟谣手法，使各种真真假假的政治流言，成为遐迩皆知的宫廷新闻，反倒搞臭了自己。精明一世的雍正皇帝，竟因一时糊涂，干下了绝大的蠢事。

乾隆早就对父亲这种不明智的作法叫苦不迭。他一上台，便不顾父亲的诏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勒令停止宣讲《大义觉迷录》，命各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收存。从而结束了这场拙劣的闹剧。

几个月后，乾隆皇帝在一系列新政中树立起宽仁而英明的形象，赢得了臣民的拥戴。在时人留下笔墨中，有这样的记载：

“高宗（乾隆）登基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

“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乾隆的皇位稳固了，这些颂词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

乾隆是在先朝重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他没有自己的亲信。雍正皇帝鉴于他们兄弟争立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防范严密，乾隆弟兄们与前一辈的皇子无法



相比，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藩邸私属的机会。而备位皇储的乾隆更是一直留居宫中。一言一行都在雍正的眼皮底下，很少属于自己的私人。所以，到他即位之时，除了“用人唯旧”之外，别无选择。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在这满朝文武当中，个个都是父亲的遗老旧臣，他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用人唯旧，避免了新旧臣僚之间的相互倾轧，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动。然而，乾隆却并不感激父亲为他安排的这种平稳的政局，当他登上御座，俯视那些虽堆满谦恭之气却是相当陌生的面孔时，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青年皇帝来说，驾驭那些久经政治风雨的老臣，确实不能不煞费苦心。

但乾隆实在是福命的皇帝，尽管他一即位便处在老臣的包围中，却不曾遇到来自臣僚的挟制，在那些阿谀和战栗的背后，也没有发现阴谋和不轨。也许他真该感激他的父亲。雍正的高压政治已经浸透了大小官员的灵魂，使他们在皇权面前俯首贴耳。

尽管如此，乾隆的心里仍然没有踏实感。专制政治，人君高高在上，却又深居九重，在与外世隔绝的情况下，政事只好委之大臣。在没有心腹股肱的情况下，乾隆又怎能放得下心呢？于是新皇帝在即位的第三天，就恢复了“密折制度”。

对于深居大内、外事并未历练的皇帝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下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无所牵制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官僚政治的风雨中，辨别是是非非。乾隆皇帝正是看中了密折制度的这一点，才使之得到恢复。

比起他的父亲来，乾隆没有来自皇位争夺的危机，但他同样面临着如何掌握驾驭群臣的难题，而密折制度无疑是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 he 可以从奏折中看到大臣们不敢公开谈论的政事，可以用朱批，批复不便在谕旨中公开发表的指示。而官员之间还可藉此彼此监视，相互牵制，即督抚大员亦不得擅权欺罔。因而，乾隆皇帝在摒弃了父亲的许多严猛统治措施的同时，却毫不迟疑地保留了雍正大力提倡的密折制度。

乾隆元年八月十三日，他颁布了实行密折制度的诏旨：

“自古人君为治，莫要于周知庶务，通达下情”。“今初理大敌，正当广为咨諏，以补见闻之所不及。其从前何等官员任其奏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着照前折奏。”



乾隆的用心没有白费。几个月的奏折看起来，他不再望着那山积般的文牍蹙眉出神了。奏折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他由此看到了他所主宰的臣民，所统治的国家。了解了当兴之利，当革之弊。他不再依赖诸王大臣的“辅政”，完全可以独立地去发号施令了。

奏折的作用越突出，乾隆对奏折的处理就越认真，每日晨起进膳后，他便开始批阅奏折。几乎每一份奏折，他都要详细的阅览，不使一字从眼前漏掉。遇有错讹之处，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心中，将原件当时焚毁。平时如此，巡幸在外也是如此。他从不委人代办。不论他走到哪里，奏折就送到哪里。批阅奏折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事实上，对于乾隆来说，批阅奏折就是在行使手中的权力。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折的作用更加突出，官员遇有机密政务，往往先以奏折形式报告皇帝，在得到皇帝的首肯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具奏，但只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乾隆由此实现了大权独揽。

三

乾隆在强化皇权的道路上，却并非尽是喜悦。他曾经忧虑过、烦恼过。

当雍正使他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的宝座时，却没有给他全权执政之柄，四名辅政大臣的存在，则意味着新皇帝尚不具备亲政的条件。乾隆隐隐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他没有忘记在祖父康熙年幼时辅正大臣鳌拜的专横，而这些历练颇深的老臣对政治的敏感绝不在皇帝之下。辅政大臣刚刚工作了三天，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便向乾隆提出取消“辅政”之名，沿用雍正皇帝居丧时的“总理事务处”。

毫无疑问，这一举动勾起了尘年往事，记起了鳌拜如何被亲政后的皇帝逮治问罪。

前车之鉴，触目惊心。于是，乾隆群臣之间第一次就权力问题而产生的芥蒂，便如此顺利地解决了，而随着辅政大臣变成了总理事务大臣，皇权的地位无形中突出了。

只是旧的矛盾刚刚解决，新的矛盾便摆在了皇帝面前，作为乾隆居丧期间的

全国最高决策机构——总理事务处仍然不能令他满意。短短数月之间，他和几位总理事务大臣已因权限不明发生了好几起摩擦，这使乾隆满心的不快，为了限制他们，分散他们的权力，乾隆又任命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公讷亲，尚书海望等人协办总理事务。但他仍然觉得不能得心应手。

乾隆是一个绝对专制主义者，这一点他酷似他的父亲雍正。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因而，不能把握手中的权力，他是决不会甘心的，而他所受的教育，所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问题，都促使他更加醉心于集权政治，提醒他抓住一切机会去实现它。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善于思索的头脑。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个月、刚刚脱掉孝服的皇帝，便借庄亲王等人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消了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他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于是，乾隆皇帝以先朝旧臣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权力机构，他看中了军机处的形式。

军机处，是雍正皇帝的杰作。然而乾隆皇帝却使它增色、增辉。

在控制臣僚方面，乾隆丝毫不比他的父亲逊色。在遴选军机大臣方面，除了“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外，主要提拔自己的亲信。自乾隆十年他以户部侍郎傅恒任军机大臣始，便逐渐在军机处换上他的心腹。而且，他一改雍正朝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个人的惯例，同时任命六人为军机大臣，分割了军机大臣的职事和权限。

经乾隆的改革和整饬，使军机处更加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成了“有事无不综汇”的权力机构。

就执掌而言，在乾隆朝，军机大臣不仅参予大政、大狱的议谳，而且要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审核内阁撰拟的谕旨，就用人、行政、科举和对外用兵等国家大事大政发表意见，制定政策、方略，还要经常充当钦差大臣出使地方。

但对军机大臣来说，最能说明地位和身份的是他们负责草拟上谕。

当时，皇帝无日不与军机大臣相见，军机大臣“每被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乾隆为了摆脱前朝老臣的影响，在军机处恢复未久，便以鄂尔泰、张廷玉年老衰迈体恤老臣为由，逐渐改由讷亲独自承旨。所谓“上初年，唯讷公亲一人承旨”。讷亲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即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由军机大臣同进见，自此





遂为成例。军机大臣将皇帝的谕旨口授军机章京，由军机章京撰拟后，再进呈皇帝，皇帝阅后发出。

对于谕旨草拟由军机大臣专属变为军机章京之职，梁章钜在《枢垣纪略》中是这样记载的：

“迨傅文忠傅恒公领揆席，满司员（司员即军机章京）欲借为见才营进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过短幅片纸，后则无一非司员所撰矣。文端（汪由敦）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自己出，嫌于揽持，及亦听司员代拟，相沿日久，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虽上（乾隆）亦知司员所写。”

乾隆年间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记下了军机司员草拟圣旨的情形：

“军机撰述谕旨，向例撰写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指示随撰随进。或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军机大臣傅恒）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到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间营，以备圣驾中途小憩者，国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促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于晷刻，究不能曲尽事理，每烦御笔改定之。”

乾隆时有“马上朝廷”之说，长年巡幸在外，像这类马上传旨，而后由军机章京由途中间歇时赶拟谕旨的事，当不在少数。虽然赵翼所讲述的是乾隆中期的事情，但由此不难联想到他初政时的情景。

军机处空前地强化了皇权，而乾隆则将军机处牢牢控制于指掌之中。于是，中枢权力完全从内阁中游离出来，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只剩下寻常的例行公事，内阁大学士虽爵位崇高，列文班之首，但如果不入军机处兼作军机大臣，不过徒有虚名。而权力受到剥夺又不独内阁，就连满族入关前沿用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成了无事可办的机构，只是个“摆设”而已。

综上所述，乾隆的初政无疑是成功的。他在巩固皇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中体验到了作“天下主”的愉悦和满足，而其中最多的感受则是艰辛和劳苦。他夙兴夜寐，孜孜求治，不论酷暑严冬，整日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万几无暇。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勤政的情形：

“上（乾隆）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闻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



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乾隆那几乎成了固定模式的日常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

乾隆酷爱写诗，游景，但繁杂的国事，初政的压力，却使他的雅兴大大减少，促使他更加勤勉用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



第二章 力排老臣

在乾隆的帝业生涯中，他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高居于众官僚之上，牢牢控制生杀予夺大权，而不和任何人分享的专制皇帝，在他统治的六十余年中，虽不乏才干横溢的大臣，但在他这个专制君主的驾驭下，却不曾留下彪炳历史的业绩。而乾隆的成功，正是从他逐渐削夺雍正旧臣的相权开始的。

乾隆初年，在他所任用的雍正旧臣中，以鄂尔泰、张廷玉的地位最高。自恢复军机处、宗室王公被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后，鄂尔泰为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居其次，均是位居宰相的重臣。二人虽然各树门户，朋比结党，相互倾轧，但却不曾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因而，乾隆帝在初政的过程中，虽不时给以告诫，却仍倚寄颇深，优容包涵。以故，鄂尔泰和张廷玉均权势旨显，并在朝廷内外负有盛名。然而，对于有极强权力欲的乾隆来说，只能有威名的皇帝，不可有能事的大臣。他使鄂尔泰和张廷玉始终慑于皇帝的天威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乾隆看来，“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所以，乾隆尤其注意对鄂尔泰的裁抑。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

清代首崇满洲，满族贵族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乾隆虽然一向标榜他处事一秉至公，无所偏袒。但事实上，具有十分明显的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他不但规定了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而且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乾隆这种崇满歧汉的思想，本来对鄂尔泰十分有利，他藉此把持住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辅的地位，并使自己在与张党的角逐中每每居于上风。鄂尔泰



当时的情况，就像乾隆在《御制诗文集》中所说的那样：

初政命总理，顾问备左右。

具瞻镇百寮，将美惠九有。

鄂尔泰在雍正所留下的一班老臣中位居首魁、权势倾朝，这是朝廷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他的骄倨傲慢，更给人以权臣震主的感觉。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署湖南永州镇总兵崔起潜上疏参劾“大学士鄂尔泰欺蔽于中，苗疆经略张广泗迎合于外”。这是影射鄂尔泰专权用事，结党营私。

同年七月，署四川巡抚王士俊，在上书指责乾隆翻前朝旧案的同时，也提出“大学士不宜兼部务”。乾隆知道，这也是针对鄂尔泰而来，王士俊是田文镜的心腹，而田文镜则与鄂尔泰久成嫌隙。

两疏虽然都在纠参鄂尔泰，但却事关皇帝。乾隆向以大权在握自诩，并以此炫耀自己的圣明。然而，刚刚登基，未及一载，就被官吏们指为受人欺蔽，隐意为皇权旁落，强烈的自尊心，使乾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言论。

于是，乾隆颁布上谕，公开驳斥说：“朕御极以来，一切政务皆躬亲裁断。即苗疆一事，大学士鄂尔泰未曾旁置一语。即总理事务大臣，亦未曾襄赞一词也。崔起潜将毫无影响之事捏词妄奏，明系倾陷大臣，扰乱国政，甚属可恶。”崔起潜因此获罪，被拏解至京，交刑部严审定罪。

皇权不可侮，更不可无，乾隆不止一次地宣称：“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所以，他对王士俊也说：“朕岂为佥任所惑之主哉？”

事实虽然并非完全如乾隆所说的那样，但当鄂尔泰在苗疆一事上作下手脚，欲置张照于死地之时，乾隆的确是确没有听信鄂尔泰的谗言，用乾隆的话说：“朕若听信其言，张照岂获生全？彼（张照）不知朕非信谗之主，而鄂尔泰又岂能谗照之人？”

鄂尔泰骄愎过甚，并不为乾隆所喜，而且乾隆不时地在挫折鄂尔泰的锋芒。

雍正生前，曾有意要将他为雍亲王时居住的藩邸旧居改建为庙宇。但当雍正帝死后，搬出皇宫另辟新居的和亲王弘昼索要原雍亲王府旧邸时，鄂尔泰为博得皇帝御弟的欢心，竟然主张将王府赐给弘昼。

赏罚唯皇帝自出，乾隆绝不允许大臣擅作主张，何况乾隆本来就认为此府



为龙腾所在，不宜再作王府。因而，他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建议，将原雍亲王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称“雍和宫”。

鄂尔泰的骄横，自然有其来由。他在雍正朝宠眷隆渥，莫可谁比。在朝廷内外已形成一股势力，在众人的心里也形成一种趋附逢迎的心态。

乾隆五年（1740年）初，乾隆帝下令让已故大臣浙江总督李卫入祀贤良祠。四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将已故巡抚田文镜撤出豫省贤良祠，理由是河南百姓恶恨其人。

田文镜、李卫、鄂尔泰，是雍正帝最推崇的三位大吏，只是三个素不相合，构衅成隙。乾隆即位以后，田文镜、李卫相继故去，只剩下一个鄂尔泰，又在朝廷中居于望位，所以，众官吏的攀附之势如蚁附膻。

乾隆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立刻看出雅尔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申饬说：“此奏并不在田文镜起见，伊见朕降旨令李卫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一语道破了雅尔图有意迎合鄂尔泰的企图。

接着，乾隆又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一语双关，既警告了鄂尔泰、张廷玉结党聚势、以权徇私，又斥责了群臣附炎趋势、揣摩钻营。

但比起警告和斥责来，乾隆更注意牢牢把握用人之权，不使他的大臣有所窃夺。

当时，聚集鄂尔泰周围的，不独微秩末禄、亦不独侍郎、尚书，就连朝廷中的皇亲国戚也在攀附之列。如蒙古额駙策凌，一到京城，就为鄂派的官员法敏、富德、常安等向乾隆帝游说，请加官进爵。还特地为富德请补随印侍读，为年老的特古勒德尔请令还京。其用心就在于投鄂尔泰之所好，博得他的欢心。对此，乾隆深知其情，也甚感痛心。他说：“额駙且然，何况他人。”

然而，痛心大臣朋党还在其次，乾隆尤其不能容忍大臣分其君权，甚至不允许在群臣中有大臣可以用权、用人的认识和心态。因而，他严厉拒绝了额駙策凌的荐人之请。并且声称：“朕御极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人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耶？”

乾隆的确不是平庸之主。他明智、敏锐，不失所察、不为所惑。而尤其难